

Opinion · column

制造业如何挣脱“夹缝”



倪金节

刚刚走出寒冬的实体经济,目前正呈现出企热、民企冷、投融资环境严峻、受资产价格泡沫“挤压”等众多难题,且演化为行业发展极不均衡的状态。

此时此刻,我们在为中国增长的发动机并没有减速熄火而欢欣鼓舞之际,更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现状,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荆棘丛生,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些问题,中国制造业才能真正踏上复兴升级之路。

金融危机的余波未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是对行业发展不均衡的最好描述。汽车工业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机遇,产销量超过美国首次达到1300万辆,汽车工业实现了稳步回升,而纺织工业与船舶工业的增长缓慢,钢铁、水泥等21个行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从数据上看,中国已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但是,规模的庞大掩盖不了中国制造业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房地产市场一片热火朝天不太协调的是,中国制造业有过冷的迹象,多数行业正在“夹缝中”寻求生存。

2009年,在强力度行政之手的干预之下,国有企业大举向各行各业拓展。从航空、钢铁到煤炭等领域,国企新一轮攻势如火如荼。无论是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还是“一揽子”经济计划中的政策扶持,都明显倾向于国有企业。

其中,让人最忧心,也最受舆论批评的是,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企、央企等“国守头”、“中字头”企业,纷纷涉足房地产行业赚取快钱,而没有多少心思投身实体经济之中。数据显示,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主营业务和房地产关系不大的多达80多家,分布在钢铁、冶金、医药、农业、化工等各个行业。有数据显示,央企中仅母公司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目前已高达1800亿元人民币。没有房地产业,这些央企的利润率将远低于当下的水平。

央企这样掌握着全国的资金资源优势,并且市场结构垄断的企业主体,都如此深陷房地产行业之中,可以想象,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已是何等的逼仄。这些年来,我与湖南商人接触最多,最深的感受是,他们每个人手中掌握着数千数百万,多则数亿的资金,但这些资金更愿意以热钱的形式存在,转投于房地产市场、煤炭矿石等资源领域,或者是股票期货市场,却是再也没有心思进入制造业。

笔者在福建泉州的“忘年交”老朋友,恒安集团创始人之一的许天培先生,几年前在

一次闲聊中就谈到,他已将其巨额的资金,与朋友周旋于江浙等地的房地产和香港股市,而始终不敢将这些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之中。至今,他依然不愿再回归制造业。许先生只是活跃于今日中国经济舞台的闽商、浙商、苏商、晋商中的一员,而之前他们都是依赖制造业起家的。

笔者虽然与浙商、苏商、晋商接触不多,但在和闽商的长期交流中,从他们口中发现,其他区域的商人对待实体经济的印象和观点和上述基本一致。

现实是,中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

大部分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大约从2006年就开始感觉到,所面临的投资环境不断严峻,利润率不断下跌。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较低、单价较低、附加值较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企业利润下滑,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减弱,生产经营形势趋于严峻,产能扩张出现转换拐点。

对于那些以OEM(贴牌生产)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以及资源、能源短缺和高消耗的影响,产业转移压力巨大,迫切要求转向更具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地区。而且,很多企业普遍存在着库存积压严重、资金周转困难、内部信息流通不畅、生产计划预测不准的问题。

2009年中国87%的经济增速,主要来自“铁公基”项目,这些大型的基础设施真正得益的是政府投资,受市场驱动的需求得益比重有限。这就使得真正能够吸收就业的一些中小型制造企业,无论是资金获得,还是市场准入方面都难以乐观。

那些在一线拼杀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生存之艰难,压力之大,超出多数人的想象。无怪乎企业家在中国得了一个“高风险行业”的名号。尤其中国企业非常正常死亡率增加,不得不让人们对企业群体最基本的安身立命都感到忧虑。

原本制造业投入大,周期长,每当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局部过热的迹象的时候,总会因为“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而成为首先被压缩的对象。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银行系统开始紧缩对民营企业部门的信贷需求,致使本就艰难前行的民营制造业雪上加霜。

中国的制造业,正急切地寻求在结构调整中能摆脱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状况,进而走上大而实、大而强的浴火重生之道。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产研部客座研究员)

Forum

上证论坛

美国经济踏上了复苏上行通道后,美方接连针对中国产轮胎、金属丝网、铜版纸、油井管等出台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人民币汇率问题”重又升温。即便奥巴马和财政部主观上有意淡化人民币汇率问题,国会中一些亲工会或制造业等利益集团的两党议员又哪里会错过对中国发难的难得表现良机,这几乎是美国选举政治中必然现象。

人民币汇率:今年注定多事之秋



刘涛

按照NBER的权威判定标准,美国经济2009年第四季度GDP强劲增长5.7%,实现了连续两个季度的环比正增长,无疑已正式走出了衰退。随着全球危机阴霾逐渐散去,在沉寂一年多以后,2010年人民币升值话题很可能暴露于聚光灯下,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于2010年人民币是否会继续升值,一般并没有太大疑问。唯一的悬念在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步伐到底有多快?是以2006年至2007年期间年均6.8%以上的速度大步飞奔,还是像2008年那般走走停停?目前,国内市场分析人士对此大多持谨慎态度,即认为人民币兑美元上半年将继续保持稳定,下半年可能会有适当升值。其中,“3%至4%”的预测已属乐观,更一般的看法是,升值幅度恐“难超2%”,甚至“有可能在1%以内”。原因无外乎是,在经历过这场世纪危机后,中国的出口行业亟待休养生息,此时若谈大幅升值,似乎不近人情。

这样的预期,当然是建立在历史经验证据基础之上的。远的且不论,近年来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人民币并未延续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开始的升值过程,而是与美元在827.828一线“盯”了整整8年之久,使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成了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但由此也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累积最为快速的阶段。

若仅从经济视角考虑汇率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开放经济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保持汇率水平稳定,甚至不升反降,的确符合出口企业的短期利益。众所周知,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过去30年里,对解决中国农村亿万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题,功不可没。

可是,出口行业并非中国经济的全部;国内也有大量进口部门,非贸易品和服务行业,以及众多雄心勃勃想早日“走出去”的企业需要发展,而这些企业往往偏好一个较高的本币汇率。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保持持续向上的调整姿态,也将激励更多中国企业下定决心实现技术改造或向产业链中高端转型——危机中出口行业的脆弱表现,恰恰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和调整已刻不容缓。

此外,市场上的一些观察者也习惯于参照境内外人民币兑美元的远期价格来预测其趋势变化。但无论是国内人民币远期交易价格,还是境外一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水平,反映的主要是基于汇率水平与其均衡价格差距,从长期来看,两者之间当然有个逐渐收敛的趋势;但这并不必然代表今后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的真实图景。

可以说,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汇率决不仅是个单纯的经济议题,它同时还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和外交问题,在未来全球经济复苏阶段的一到两年内,人民币兑美元会如何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如何互动。

从美国角度来看,一些特殊政治、经济因素汇集到一起,为2010年中美关系中的人民币问题平添了几分风险和不确定性。

2010年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年。自2008年9月危机加剧以来,为共渡难关,包括中国、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G20的大旗下同舟共济,美国国内对于人民币议题的批评和指责也随之销声匿迹。然而,当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以后,可以说美国经济的一只脚已踏上了复苏上行通道。外部压力减轻后,这种危急时刻的合作情谊对于美国而言就不再那么必要了,于是美方接连针对中国产轮胎、金属丝网、铜版纸、油井管等出台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重又升温也是迟早的事,并不会特别令人意外。

2010年还是奥巴马试图重新证明自身价值和能力的一年。在奥巴马最新公布的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了失业给美国民众带来的焦虑感。目前,10%以上

的失业率正令奥巴马民意支持率持续下降,奥巴马本人也承认,“仍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找不到工作”。因此,未来两年能否为美国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将成为奥巴马2012年赢得大选的风向标。而制造业和出口行业,则被奥巴马视为创造就业的重要希望。

回顾奥巴马上台一年来的表现,其视野更多是内向型的,而贸易和汇率等对外政策则常常服从于国内现实主义的需要。最令人心的是,与小布什不同,奥巴马并非是个坚定的自由贸易拥护者,而更像个投机者,不排除为达成上述目标,他会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等问题上与国会达成默契和交易。

2010年还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重要年份。即便奥巴马和财政部主观上有意淡化人民币汇率问题,国会中一些亲工会或制造业等利益集团的两党议

员又哪里会错过对中国发难的难得表现良机,这几乎是美国选举政治中必然现象。

而站在中国立场上,这却分明是一条不容挑战的红线。早在2005年7月升值之初,中国政府就已明确了人民币升值的原则,即这一进程必须“渐进、可控、主动”。换言之,人民币升值只能取决于中国政府自身的判断和时机选择,而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但这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态度,也有可能在此种程度上扭曲国内对于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实际需要。

故此,美国行政、立法部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指手画脚,只能产生负面效果;相反,倘若美方降低调门,留出政策空间,或有助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做出逻辑清晰的形势判断和政策选择。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

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

王勇

中央日前发布今年一号文件,强调新的一年要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毫不松懈地抓好农业农村工作,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新的贡献。笔者认为,当前农村资源要素中亟待配置金融资源要素。

目前,即便是各金融机构在不断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但限于风险控制考虑,各金融机构对农村信贷设置的准入门槛仍然较高,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严重不足。投向农村的资金要求提供相应的抵押、质押及不动产等担保,由于目前土地承包权抵押存在很大难度,农民贷款缺乏有效的抵押品,又缺乏专门的担保基金或机构为农户提供担保。因此,资金需求相对较多的农户、农村企业贷款普遍出现抵押难、担保难和贷款难。其次,农村保险业严重萎缩,无法满足农民对风险控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全国各地农村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省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对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出依赖程度较高。东、西部金融资源要素配置质量差异很大,西部大部分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还未能体现出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未能很好地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需求。再有,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相对滞后。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垄断和一些体制上的弊端,农村金融产品创新缺乏准入机制;再加上缺乏科学的制度安排,又使得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严重滞后,显得比城市更为艰难。农村金融网点以农村信用社机构为主,竞争很不充分,在业务品种上依然以存贷为主,很少或根本没有办理代收代付、个人理财等中间业务。

所以,科学合理配置农村金融资源要素,当前应先行。第一步,是规范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无论是数量还是结构,都应适当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切忌“一哄而上”。当前应继续深化

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形成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加快做实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把农业银行县域支行真正改造成为“四自”的经营单元;农发行要大力开展农业开发、土地规模化整理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业务,国家控股的大型银行和各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开办农村金融业务,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另外还要加快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农村保险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并落实相应的政策支持与风险监控措施。

接下来,是加快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要根据当地的“三农”金融需求,把握好创新的重点和突破口。要着力扩大农户小额贷款投放,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鼓励开发多样化小额信贷产品。要通过多项政策的组合,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内在积极性,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向“三农”。要进一步探索解决农村融资担保难问题,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程度高的地区,金融机构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当地党委和政府组织推动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房用地制度改革,探索开展相应的抵押贷款试点,丰富“三农”贷款增信的方式和手段。

更深一步,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吸纳能力。要从政策环境、信用环境、科技投入、劳动要素、土地要素等方面入手,制定相应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引导资金向农村流动或在农村市场固化、生根,实现增值;还要依托金融优势资源,着眼于提升农村经济的规模、质量和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彻底放弃并利行政手段干预农村金融资源要素配置的做法,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培育金融文化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上,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真正市场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高级培训师)

给奥巴马看点颜色



袁晓明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罗斯福总统就开始追求“所有人都享有医疗保险”的理想,可直到奥巴马在2009年正式就任美国总统,60多年过去了,如今,美国仍有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所有人都享有医疗保险”仍然还是梦想,是奥巴马竞选期间的重要许诺。

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前,奥巴马入主白宫时,民主党在美国政坛的势力几乎是达到了顶峰,国会参、众两院的领导权都交在了民主党的手里,尤其是参议院的100个席位,60个席位属于民主党的阵营。按政治术语来说,60个席位是“超级多数”,即使所有共和党人拒绝投票,民主党也能以60个席位的“超级多数”通过法案,比如医疗改革法案。想来,对于奥巴马以及民主党来说,他们应该是对票数做了简单统计的,他们认为,仗着民主党在美国政坛的绝对优势,实现“所有人都享有医疗保险”等政治梦想,2009年是最好时机。

但是,奥巴马以及国会民主党领导层没有想到的是,掌管了白宫,又有了国会“超级多数”的政治权力,并不能保证民主党在2009年就有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多数”执政。相比之下,在2000年、2004年,布什政府执政时,共和党在国会并没有当今民主党那么大的优势,但布什政府却在执政第一年通过了多项法案,而奥巴马政府以及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在2009年收获甚少,尤其是在医疗保险法案方面。奥巴马原计划在2009年夏天就能签署医疗改革法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民主党全力推销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完全可能会夭折于摇篮之中。

为什么民主党在白宫,国会山大权在握,却不能在通过医疗保险法案上如愿以偿?

没错,国会山上的共和党人铁了心反对民主党版本的医疗改革法案,但他们的反对票,并不足以阻止民主党通过医疗改革法案。事实上,2009年内,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分别通过民主党版本的医疗改革法案,只是参、众两院是两个不同的法案,这两个法案必须合并,才能送到奥巴马那里去签署,正是这样的合并,才出了麻烦。

从过去美国政坛的历史来看,在两党势力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两党可以通过选票进行政治斗争,如果一党掌管白宫,另一党控制国会山,更可以通过国会与白宫的相互制约

求得平衡。里根年代,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两党在斗争中相互制约,克林顿政府时期,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也并非是一党大权在握,克林顿政府与国会有了不少妥协。2009年,共和党实力一落千丈,难以对民主党有所制约。2008年的大选后,美国政坛权力大转移,使一个党派几乎达到了垄断的程度,那的确是选民一个比较大的冒险,但美国政治体制的设计有其独特的一面,在反对党失去制约,一党大有“独裁”倾向时,选民就开始挺身而出,通过民意调查、与国会的通讯联络、游行示威等等方式来表达对民主党一党执政的不满,而过去3个月的几次选举,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民意对民主党权力的直接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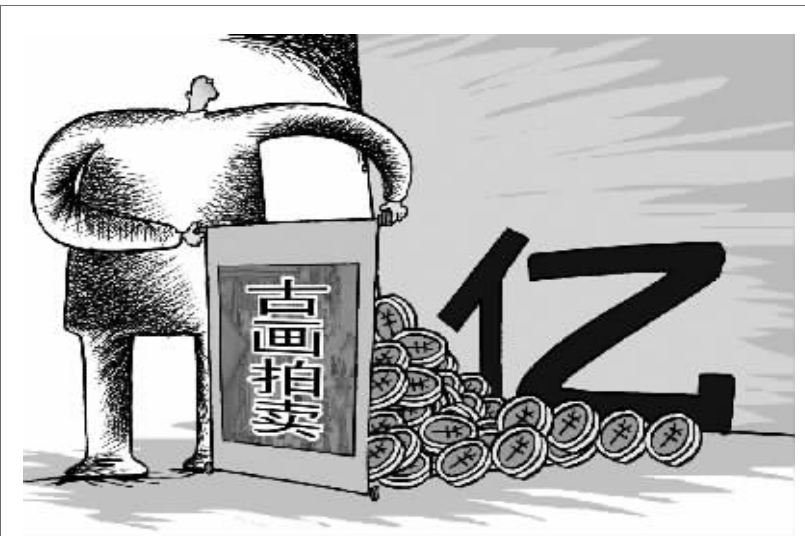
2009年11月,新泽西选民把共和党人推上州长的职位,弗吉尼亚州也选出了共和党的州长,而在一年前,奥巴马在这两个州都以获得大比分胜出。选举后的调查发现,许多选民就是要通过州长选举把民意送到华盛顿,2010年1月19日,民主党的老巢麻省举行参议员的补选(填补去世的肯尼迪的参议员席位,肯尼迪在这个席位上坐了47年),选举结果,居然是共和党人布朗获胜。这将把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提高到41个,从而结束民主党的60个席位的“超级多数”,民主党在合并参、众两院医疗改革法案时,就不能以60票的“超级多数”强行通过了。

布朗的竞选许诺,就是要选民把他送到华盛顿,去反对民主党的医疗改革法案。而麻省的众多选民目标也非常明确,投票期选票的多数选民,并非共和党人,因为麻省只有12%的选民注册为共和党。所以,布朗此次获胜,被称为美国政坛的一次强烈地震,把选民对民主党政权的反抗表达到了极致。

选举结束后,众多民主党人士表示,奥巴马政府以及国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必须改变方向,不能强行通过医疗改革法案了,否则的话,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上也许会输得一败涂地。连在麻省民主党都输掉了,在其他州,又能有多少把握呢?许多面临选举的民主党参议员、众议员,不得不为自己是否失业而担心了。

可以说,奥巴马执政的一年,正是民主党政权与美国选民斗争的一年。在政府权力VS民意过程中,哪怕民主党在白宫、国会大权在握,最终还是民意获得了胜利。

(作者系高级管理咨询顾问,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古画登上亿元台阶

当人们还在讨论中国艺术品市场要用3年还是5年才能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时候,突然之间,古代书画数个亿元级成交宣告了中国艺术品进入了“亿元时代”。疯狂已无可争议,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古代书画的高热度能持续多久? 漫画 刘道伟

靠深度市场化破除两难困境

张志鹏

中国经济2009年不仅确保了“保八”,而且在带动世界慢慢走向经济复苏道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存在着一些担忧和怀疑。例如,有国外专家认为铁路等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2009年前三个季度占GDP的45%,“对任何经济体,这都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数字。”一些国内分析者也认为进入2010年后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具挑战性的两难境地,如果出口出现快速恢复,信贷和投资继续扩张,中国将面临经济过热;如果出口依然低迷,投资和消费后继乏力,中国将陷入滞胀风险。

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早就确定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和效益。然而,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两难:一方面,产能过剩持续严重,增量资本产出率居高不下,出现投资回报递减现象。在投资的热潮中,不仅一些传统落后产能过剩加剧,部分行业出现逆向调整,而且“高水平重复建设”又埋下了产能过剩的新隐患。报告显示,2009年铝业、风力发电、炼钢、水泥、炼油、化工等六大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0%-85%左右,产能过剩的规模庞大,仅炼铝业08年的

产能过剩数量(19亿吨)就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

由此,笔者以为,当经济运行中的两难困境还未得到解决时,尚不能奢谈“后危机”时代的策略,而应及时思谋如何真正走出深层次的危机之源。

两难困境的存在,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有关。一些关键领域、产业和要素的资源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配置时,就会出现扭曲的经济结构以及剧烈的波动和传导。具体来看,一是人民币汇率调整滞后于市场价格,导致了长期的出口依赖。当人民币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于其市场价值时,中国的劳动力、环境和资源在国际市场上就会更低,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继续猛增。在出口依赖背景下,中国不得不通过出口退税、汇率稳定、降低融资成本(低利率)政策维持出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体的生存。二是长期出口依赖造成了投资依赖,投资规模脱离市场需求剧烈波动。当出口上升时拉动民间投资增长,一旦出口下降,就会触发政

策性投资,在近10年来,民间投资与政策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

策性投资,在近10年来,民间投资与政策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

策性投资,在近10年来,民间投资与政策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

策性投资,在近10年来,民间投资与政策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

策性投资,在近10年来,民间投资与政策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

策性投资,在近10年来,民间投资与政策的总产出。另一方面,通胀的风险持续存在。一般来说,产能过剩所形成的产出缺口,会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在超额货币和通胀的社会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下,会抵消产能过剩带来的抑制作用,造成物价结构性上涨甚至全面上涨。